

科学发展丛书

主编：薛 澜 胡鞍钢 苏 峻 于永达

和谐的增长

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

HARMONIOUS GROWTH
STUDY 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NEW AGE

史东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科学发展丛书

主编：薛 澜 胡鞍钢 苏 峻 于永达

和谐的增长

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

史东明◎著

HARMONIOUS GROWTH
STUDY 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NEW A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的增长: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史东明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
(科学发展丛书)

ISBN 978-7-302-14256-0

I. 和… II. 史… III. 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514 号

责任编辑:周 菁 王荣静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刷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60 印 张:17.25 字 数:319 千字

版 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2.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3222-01

序

2002年6月,史东明博士被选拔为北京市高校两课教学的学科带头人,曾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做了深入研究,经过三年多努力,他完成了这部著作——《和谐的增长》。

和谐的增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实现和谐增长,必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史东明博士的这一著作,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提出了和谐增长动力模型,全面地把经济动力机制、社会动力机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完善的经济增长动力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思想。它所强调的核心,就在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持续稳定经济增长,最终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全面奔小康,如果没有公平、公正机制,仅使少数人致富,社会问题就会日益突出,社会矛盾就会日益激化,经济增长动力就会日益萎缩。

《和谐的增长》一书在研究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上,还深入分析了和谐增长的结构效应、制度效应、金融效应、科教效应、全球化效应和知识经济效应,并对实现和谐增长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和相关机制。其中每一种效应分析,都揭示出以往存在的非和谐问题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制约。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快速增长。例如,我国的区域发展,在新时期要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均衡增长,就必须缩小现存区域发展巨大的差距,必须加大对中西部投资力度,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加快中西部发展。中西部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和和谐增长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目前在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而且因为中西部地区分布着广大的农村、农民和农业产业,在这里实现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发展现代农业、普及中等教育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为迫切,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依然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国实现经济和谐增长的一个突出任务是,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我们既需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发展循环经济解决,又需要通过加强立法和加强管理等手段来严格治理高消耗、高污染问题,否则单靠市场机制将会加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导致低质量增长的恶性循环。作者没有就经济问题谈治理措施,而是从维护国计民生、公

共安全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的高度建立合理调控机制,以实现公平、公正的和谐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不但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治理环境、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不断提高增长质量的经验,而且需要反对和抵制那些以邻为壑的做法,拒绝把发达国家的落后产业转移到我国。发展知识经济同其他增长机制一样,需要和加快教育发展、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等有效结合起来,要以人为本、尊重人才、健全民主制度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不仅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且让他们能平等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增长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未来发展中,任务将更加艰巨,必须解决不和谐、不公平、不公正问题,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加强宏观调控,维护社会稳定,把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仍然是我们未来成功的根本保证。

史东明博士的著作《和谐的增长》,通过建立新时期经济和谐增长动力体系模型,分析和谐增长的效应,对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我祝愿,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7年2月

前言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新时期^①,无论是要素条件、投资条件,还是需求条件、供给条件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按恩格尔系数统计,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依然十分落后,“三农”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工业化进程。1997—2002年,我国共出现两次较大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许多迹象表明,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根据国际工业化的经验,刚度过经济起飞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还有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道路可走,如果过早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对今后的发展将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对引起我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予以重视。探寻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关系到未来的发展大计,关系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本书总结了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如下观点: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既要反对以政治运动干预经济建设、以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以人的主观意志代替经济规律的传统做法,又要反对盲目跟从新自由主义思潮,把市场机制极端化,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追求GDP指标而忽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错误倾向。以上两种极端倾向,都不利于形成持久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发现凡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经济都不成功。例如,阿根廷这个被西方国家誉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样板’国家”,由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前10强滑到第80位,成为“第四世界”国家,并于2001年底爆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巴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两极分化加剧,社会治安恶化,暴力犯罪率上升,直接影响到其经济的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改革方案,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少数人攫取国有资产而一夜暴富,而

^① 本书的“新时期”是指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六大为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改革前。此外,一个时期由于俄罗斯排斥外资,不重视农业改革和发展小企业,没有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消费品并为工业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经济长期上不去,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即使在长期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因收入分配不公,同样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下降,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发生持续衰退;相反,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崛起为第二经济强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盲从新自由主义,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注意协调劳资关系,大力促进国内以“3C”为特色的消费(“3C”即汽车、彩电、空调消费);德国、瑞典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实行相对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新加坡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与高效廉洁的政府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很大关系;爱尔兰、芬兰由于重视经济公平、积极改善人力资源条件,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分析了经济体制、制度、结构以及增长模式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动力系统进行了修正,构建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新时期经济和谐增长动力系统及其机制。新的动力系统强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增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认识到同市场机制驱动一样,公平也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本书特别就形成新时期强大增长动力的六大源泉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索:①发挥结构效应。新时期不仅需要加快三次产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步伐,而且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同积极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没有比增加就业更重要、更艰难的事了。不解决好如此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就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也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不能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②发挥制度效应。制度效应的关键在于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人才制度等改革,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时期需要尽快建立起符合国力民意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③发挥金融效应。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但具有动员储蓄、配置社会资源和分散风险的功能,而且负有促进社会经济公平、保护普通百姓免遭金融风险打击和抵抗灾害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金融效率和竞争力,对促进经济和谐增长至关重要。④发挥科教效应。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放大科教效应,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由要素推动、投资推动转向创新推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发展教育,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增加

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并使教育成为促进平等发展的有力手段。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对于科技进步,也要以国家为中心走产业化道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不断扩大创新成果,增加科技投入,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强大的动力。⑤利用全球化效应。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国当前面临的战略选择,我国必须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认真转变政府职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学习创新效应,提高企业产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利用好国际机遇,应对全球化挑战,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前提和重要保障。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我国需要进一步发挥全球化的积极效应,避免其负面效应,加快国际经贸和国际投资步伐,以有力推进经济高速增长。⑥开发知识经济效应。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要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目标,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知识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才能赢得后发优势。新经济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需要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迎接它,并切实解决好有关实际问题。

经济增长动力的强弱,对经济周期波动会产生一定影响。在分析各时期经济周期成因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增强增长动力、减缓经济波动的六项措施,并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施行不同以及外部环境不同,所形成的增长动力会不一样。即使采用同一政策,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例如,改革初期中国实行先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政策,对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激发经济增长动力,起到很大作用。但在目前形势下,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只能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因此,新时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陷,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以激发新的更强大的增长动力。同时,还要谨防经济过热,避免发生大起大落。特别是2003年,中国经济突然高增长10%,在一些行业和地方出现了过热现象,这一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004年、2005年中国经济仍在高位增长,2004年增长率高达10.1%;2005年增长率达到9.9%,几乎都是以高资源消耗和高能源消耗以及环境的高度污染为代价的。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1%,但所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分别为世界总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①这种情况是与中国实现现代

① 参见邹声文等:“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亟须破解哪些难题”,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60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10月。

化目标相背离的,不利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相应的社会风险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诱因。”(沈杰,2006)

中国经济的和谐增长动力体系应当成为开放的多元化的系统。本书的研究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的思想,而且吸取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动力钟”理论、凯恩斯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动力”理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波特的“竞争力与国家繁荣”理论、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论以及罗伯特逊等人的“对外贸易发动机”理论等,并且结合中国经济实际,形成了新的和谐增长动力观。新的增长动力不能以单一的GDP增长指标来衡量,而应以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综合效果来考察增长动力的实际形成,以及这种增长动力对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新时期我们需要建立绿色GDP综合指标体系并以此来考核经济增长与经济成果。因为只有将环境损失和资源成本等因素考虑进去,经济考核才可能是全面的和可靠的。增长不过是手段,以人为本的发展和追求人类共同的长久的幸福才是根本目的。任何脱离这一目的的手段都不能形成健康、持久、稳定的动力,而且违背人类根本利益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的做法本身是有害的、错误的、不可取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经济学家必须关注人类的终极目标。”新时期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形成经济增长动力,然后以这种动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曾指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①中共十六大重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中国的GDP在2000年8.9万亿元(1.1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再翻两番作为量化目标。按照中国科学学院的测算,按目前年均GDP增长7.18%,到2020年就可实现在2000年经济增长基础上再翻两番,初步完成工业化。因此,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最宝贵的机遇期,为了实现宏伟目标,仍需要加倍努力,保持旺盛的经济增长动力。尽管我们强调不能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以绿色GDP考核指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永远是极其重要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目 录

第 1 章 探寻经济增长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1
1.1 经济增长动力关系经济发展的后劲	1
1.2 中国经济增长 55 年的简要回顾	3
1.3 对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通货紧缩的忧思	6
1.4 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一个系统性课题	9
第 2 章 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理论	13
2.1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动力钟”	13
2.2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分析	15
2.3 凯恩斯对付经济萧条的灵丹妙药	17
2.4 熊彼特的“创新”增长动力	20
2.5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与增长动力	22
2.6 诺斯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24
2.7 波特的“竞争力与国家繁荣”钻石理论	27
2.8 罗伯逊等关于“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29
第 3 章 改革开放：邓小平“经济发展动力”研究	32
3.1 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32
3.2 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36
3.3 开放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39
3.4 邓小平的和谐发展思想	42
第 4 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45
4.1 全面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	45
4.2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平等发展	52
4.3 推进民主进程，实现第二次思想解放	59



第5章 新自由主义苦果:国际教训反思	65
5.1 阿根廷的全面历史大倒退	65
5.2 巴西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挑战	70
5.3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教训	75
5.4 腐败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81
第6章 国际经济增长经验借鉴	86
6.1 日本何以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	86
6.2 德国、瑞典等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91
6.3 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楷模	97
6.4 和谐增长是正道	99
第7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和谐增长动力系统及其机制研究	102
7.1 和谐增长动力系统——对原有增长动力系统的修正	102
7.2 经济和谐增长的基础与关键	106
7.3 经济和谐增长为什么要重视人的发展	112
7.4 开放的和谐增长动力系统	121
第8章 和谐增长的结构效应	125
8.1 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25
8.2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非合理性	130
8.3 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对策	135
第9章 和谐增长的制度效应	145
9.1 制度功能评析	145
9.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及特点	152
9.3 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制度改革问题	159
第10章 和谐增长的金融效应	168
10.1 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分析	168
10.2 中国金融的改革进程	173
10.3 未来道路:中国金融在稳定中求发展	180

第 11 章 和谐增长的科教效应	190
11.1 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190
11.2 当前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现状	193
11.3 推行以人为本的科教兴国战略	200
11.4 科教发展与公共政策	204
第 12 章 和谐增长的全球化效应	210
12.1 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10
12.2 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216
12.3 谨防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225
第 13 章 和谐增长的知识经济效应	229
13.1 信息化是新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	229
13.2 新经济所依赖的制度供给	232
13.3 中国怎样抓住新经济的机遇	235
13.4 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240
第 14 章 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实现持续、稳定、和谐增长	244
14.1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	244
14.2 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249
14.3 减缓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措施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65

第1章 探寻经济增长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有人把它称为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总之,无论怎样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能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给人民带来福祉。然而,如同运动员赛跑一样,有些运动员开始跑在最前面,后来因体力不支慢慢落在了后面,被体力旺盛的后来者超越了。在各国的经济增长竞赛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国家先盛后衰,一些国家中场告退,如15世纪法国和西班牙曾领先于世界各国,维持了100年左右的繁荣后便被尼德兰和英国超越。18世纪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这使英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赢得了世界制造中心和霸主的地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实力大大下降,增长速度放缓,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取代了“日不落”英国的地位。1937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2%,194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4.6%。20世纪50—80年代,美国的增长速度减慢,曾被日本和联邦德国超过。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长期繁荣时期,增长能力再次位于发达国家之首。在发展中国家,阿根廷曾跻身世界经济前10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誉为“阿根廷奇迹”,但自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已从世界增长的行列中消失。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源于经济增长,如果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就会趋缓或停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如90年代日本经济连年发生负增长)。经济增长需要不竭的增长动力来维持,探寻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并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1.1 经济增长动力关系经济发展的后劲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通常用一定时期内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来衡量。用传统的语言表述,经济增长即国民财富或社会财富的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必将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一般生活水平的变化、教育状况



的变化、健康卫生状况的变化和环境生态状况的变化等。持续稳定合理的经济增长,必将促成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良性发展。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着经济增长要素进行了长达 200 多年的讨论,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 3 个要素(Tanzi and Zee,1997):①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②在一个国家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③技术进步。20 世纪 60 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和资本投入为自变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得出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停止的结论。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保罗·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将长期增长率归于内生因素,即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几乎与此同时,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丰富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新制度学派还指责新增长理论与创新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只是讲增长本身,并没有说明导致经济增长现象的真正动因。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的问题,而非经济增长要素或其他增长理论。增长要素作为一种增长原理,对各国经济增长是普遍适用的。但各国在不同的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可能会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要素有的或许能成为一种增长动力,有的则与增长动力并无多大关系。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增长要素是一种增长的元素,经济增长动力是使元素很好地发挥作用的促进力量或推动力量。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自己的增长动力,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效果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动力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后劲。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动力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构成了复杂的动力系统。在这一增长动力系统中,影响因素越多、机制越灵敏,产生的动力就越大、越持久。相反,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形成这样的动力。如奴隶社会仅有奴隶主的穷奢极欲和贪得无厌成为某种增长动力,充其量不过能维持其简单的再生产或稍有剩余而已;到封建社会,除了地主剥削农民之外,由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提高了劳动热情,它使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有了人身自由,因此增长的动力扩大了,产出相应也就增多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欲望达到极致。此外,由于大机器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明不断涌现,生产管理日益科学,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资本的国际流动不断加速,一系列因素促使资本主义

经济增长动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提高。在短短 200 年时间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向工业化的转变,不断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但是,为什么经济发展速度不理想呢?关键在于,没有利用好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没有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僵化的思想政治体系和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经济活力,难以形成持久的增长动力。通过新中国成立 55 年的经济增长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可以看到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必要性,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以及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性,这对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宏伟目标至关重要。

1.2 中国经济增长 55 年的简要回顾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中国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 80% 以上,钢产量只有 15.8 万吨,棉布产量只有 18.9 亿米,粮食年产量只有 2 162 亿斤,灾民 4 000 多万人。经过 3 年经济恢复期的艰苦努力和经济改造(如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等),使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到 1952 年底,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34%,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了 23%。同 1949 年相比,钢产量增长了 7.5 倍多,生铁产量增长了 6.6 倍多,金属切削机床增长了 7.6 倍多,化肥增长了 5.7 倍;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了 48.4%,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30% 上升到 1952 年的 43.1%;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下降为 58.5%;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56.4% 上升到 1952 年的 64.2%;全国职工总数比 1949 年增加了一倍,并解决了失业问题。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的。

三年经济恢复期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①新中国成立,政通人和,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搞建设;②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使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热情无比高涨;③经济改造过程中财产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激发了经济活力并提高了生产资料利用效率。

1953 年后,中国经济朝着工业化目标迈进。“一五”(1953—1957 年)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全面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1.3%,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8.0%,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 4.5%。这些数字超过了同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如:同期英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 4.1%,美国为 2.8%。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有:①中国共产党中央

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独立的、全面的工业体系;②依靠政府力量和计划手段,调集社会资源,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156个大型项目(实际为154个)的建设。这两项措施的作用体现在:前者促使小农经济转向现代经济,为专业化农业生产打下基础,促使个体手工业走向合作生产道路;后者则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化基础和一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中国在“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率达到6.5%,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会翻一番,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被以后的政治运动无情地阻断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尚未结束,1958年的“大跃进”继之又起,这些政治运动干扰了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未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被迫搁浅。“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出现衰退,迫使中国不得不从1961—1965年进行五年漫长的经济调整。1965年经济调整刚刚结束,全国经济出现了振兴势头(如石油自给,“两弹一星”发射成功等,各行业喜讯频传),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十年动乱使党和国家迷失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从工厂到农村,停工停产,全国上下到处开展政治斗争,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经济严重滑坡,如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比1966年下降了9%,1968年比1967年又下降了4%。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此作为发展经济或增长的动力,其结果可想而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57.6%,而同期美国增长了124%,法国增长了212%,日本增长了345%。且不说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强于中国,亚洲“四小龙”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经济起飞的。“文革”十年和“反右派”、“大跃进”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国以深刻教训:政治运动和动乱只能导致经济停滞衰败、人民生活贫困,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及时地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而是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虽然他们关心经济建设,竭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如1977年和1978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7%和9%,同时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4.3%和13.5%,但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洋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造成了很大浪费和损失,以至于出现了1979年后的3年经济衰退和经济调整。这一段时期,可以称之为“历史转折期”。

直到1979年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国破除“左”的思想束缚,中国才逐渐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商品经济阶段,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发挥功效,加上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经济增

长越来越有规律可循。从1979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动力是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一动力系统中,分为若干动力子系统或动力分支。例如:①将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即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的250美元增加一倍,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第三步在21世纪前30~50年内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即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②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激励机制,充分解放生产力。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城市工业产权改革,改革每深入一步,经济增长速度就快一步。③不断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利用国际机遇和国际资源。1979—2002年,中国利用外资合同金额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4479.66亿美元。200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2000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中国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达到44%。据有关部门测算,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度在2000年约达到0.023。④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口众多、资金短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能否有效地增加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在资本形成中,首先要使本国储蓄达到一定水平,然后将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再由投资形成实际资本。1978—1997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平均为37.1%,而在1993年以后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世界各国这一储蓄率是很高的。由于资本要素在生产中发挥作用,推动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收入增长进一步促进储蓄增加,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二十多年来进入“储蓄—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⑤非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如城乡集体经济、外商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等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由于企业制度不同,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经济。非国有工业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从1982年的32.8%上升到1997年的90%左右。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已占到总出口额的44.1%,比1987年的3.1%增长41个百分点。乡镇企业的出口交易值也稳步上升,1997年占全国份额为36.1%,同年完成的工业增加值则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7.3%。⑥居民消费—市场需求的拉动。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调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计划经济实质是“政府需求依赖型经济”。改革后,随着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居民成为社会需求的核心,居民消费形成最终需求,企业的生产活动围绕着居民消费形成最终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由居民消费需求和投资拉动,因而经济转型为“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由于居民根据市场价格、收入水平、偏好和预期等经济变量进行消费/储蓄决策,所以居民的消费/储蓄倾向成为影响总量消费趋势的决定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